

# 底层如何设计：避免“底层之殇”的文化研究

佚名

2025-02-05

## Abstract

本文聚焦“底层之殇”在文化层面的成因与机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及后殖民理论等多元视角，探讨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再现。通过分析大众文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女性议题与身份政治等议题，提出若干文化策略，以期在社会想象与结构转型中为避免底层悲剧命运的循环提供思路。

## Contents

1	底层如何设计：避免“底层之殇”的文化研究	1
1.1	引言	1
1.2	理论框架：批判视野下的底层文化书写	2
1.3	大众文化与底层形象的再生产	3
1.4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底层的生成	5
1.5	文化产品：底层主体性的再现或遮蔽	6
1.6	女性主义介入下的底层经验	8
1.7	底层叙事与身份政治：话语突围的可能	10
1.8	避免“底层之殇”的文化策略	12
1.9	结语	13

## 1 底层如何设计：避免“底层之殇”的文化研究

### 1.1 引言

“底层之殇”这个概念指涉了社会底层群体所承受的结构性伤痛和悲剧，其背后是权力、资本和文化多重作用下的集体命运。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大量被边缘化的人群构成了所谓的“底层”：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边缘化、文化上遭污名化。从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到城市角落的拾荒者，从乡村留守的妇孺到城市漂泊的务工者，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异质性。然而，主流话语和大众文化往往以扭曲的镜像再现底层，将他们定格为被动的“他者”，从而遮蔽了底层主体自身的声音与能动性。这种文化再现方式不仅让底层群体经受物质的匮乏，更加剧了他们在象征空间中

的失语和形象固化，导致一种“底层之殇”的不断再生产。

面对这一问题，如何从文化层面“设计”底层、亦即重新塑造关于底层的社會想象，以避免底层悲剧命运的循环，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本文将立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兰克福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多元框架，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塑造机制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大众文化如何再生产底层形象、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何塑造新的底层、文化产品如何成为底层主体性的再现或遮蔽、女性主义如何介入底层经验，以及底层叙事与身份政治如何突破主流话语的规训等核心议题。通过对文学、电影和现实社会事件的案例分析——包括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如刘庆邦、余华等人的作品）、第六代/第七代导演的电影（贾樟柯、李杨等对“小人物”的呈现）、以及社会学者的底层调查（如吕途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思想上实现对“底层之殇”的超越与反思。最后，文章将提出若干文化策略，以期减少底层悲剧的再生产提供可行的路径。

## 1.2 理论框架：批判视野下的底层文化书写

在分析底层议题时，我们需要一个多维度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底层困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解底层受压迫地位的经典视角：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往往内化并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透过意识形态将现存的不平等合理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底层群体之所以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不仅是经济剥削使然，也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塑造了社会对底层的成见，使底层的痛苦被常态化甚至道德化（例如将贫困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从而维护现有权力关系。

文化研究的兴起（尤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进一步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并非单纯的反映层级，而是成为权力斗争的关键场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理论表明，统治集团通过大众文化来塑造群众的常识与价值观，令被支配者自愿接受支配。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则揭示大众媒体如何编码社会意义，在种种再现（representation）中巩固刻板印象和社会等级。在底层问题上，这意味着底层群体的形象往往被媒体以富有偏见的方式再现：要么被浪漫化为“朴实而悲情”的受难者，要么被污名化为“落后、暴力”的社会问题来源。在这种再现中，底层不被当作具有主体性的具体人来看待，而是被凝视和消费的对象。文化研究的理论提醒我们，要解构这些影像背后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关注底层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与权力的关系。

女性主义理论则为理解底层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性别视角。长期以来，底层叙事中女性的

声音往往更加幽微：底层女性不仅承受着阶级压迫，还往往深陷父权制的双重枷锁之中。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曾强调，性别、种族和阶级是交织在一起的压迫系统，底层女性处于这些系统的交汇点上。因而，一个文化研究取向的底层分析必须融入女性主义的关切，去发掘底层女性在劳动、家庭和身体上遭遇的独特困境，以及她们如何发展出隐秘而坚韧的生存策略。如果忽视了性别维度，我们对于底层之殇的认知将是不完整的；只有将“她们”的故事纳入宏大的底层叙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底层经验的全貌，并寻求更具包容性的改变路径。

后殖民理论则将我们的视野拓展到帝国主义历史及全球权力结构对于底层处境的影响。后殖民批评指出，殖民时期形成的支配—被支配话语持续形塑着现代世界，对于当代底层的想象也留下深刻烙印。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仍然存在权力不对称。底层群体常被描绘成“需要拯救的他者”，这种叙事与殖民话语中“文明教化野蛮人”的逻辑一脉相承。正如斯皮瓦克所质问的：“底层能否发声？”（见 严飞 2022）——在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中，被殖民者、被压迫者（无论是殖民地人民还是国内的底层群体）常常被赋予沉默的形象，他们的声音要么被遮蔽，要么被权力话语所挪用和歪曲。因此，后殖民理论敦促我们警惕文化中的“他者化”过程，反思在国家内部和全球南北关系中，底层群体是如何被建构和对待的。这为探讨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塑造底层及其文化再现奠定了基础：我们需要意识到，底层之问题并非某一国的孤立现象，而是全球体系的产物，既涉及跨国资本和权力的运作，也涉及本土权力对边缘地带的“内部殖民”。

综合而言，马克思主义批判、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共同构成了本文的理论支架。它们分别从经济结构、文化霸权、性别视角和全球权力格局等不同层面，提供了理解“底层之殇”的钥匙。在此多重视域下，我们以下将围绕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层层深入地剖析底层形象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政治，并寻求可能的突围方向。

### 1.3 大众文化与底层形象的再生产

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包括新闻媒体、通俗文学、电视电影以及新兴的网络内容）构成了大众对“底层”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这些由主流话语主导的文化产品往往以刻板的模式再现底层形象，不知不觉地将底层群体定型化，进而再生产出对底层的不利认知和社会关系。这种“再生产”一词在此不仅指影像和叙事的重复出现，更意指一种社会意义和权力关系的复制与固化。

首先，大众媒体经常以猎奇或怜悯的视角报道底层故事。新闻中对于贫困、工人抗争、

弱势群体事件的呈现，常常聚焦于令人唏嘘的个人悲剧或道德困境，而很少深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这种处理方式强化了底层作为悲惨但无力的对象的印象。例如，当媒体报道农民工讨薪或失业者犯罪时，时常将之简化为个人的不幸或品德问题，把结构性的不公平隐匿于幕后。底层由此被描绘成社会机体中的“问题存在”，他们的困境要么被当作同情的对象以凸显主流社会的善意，要么被当作社会秩序的威胁以证明现行管控的必要性。无论哪一种，底层形象都被他者化、扁平化，不再具备丰富的人性主体力量。

其次，娱乐性的大众文化对底层形象的处理也充满了套路化。在影视剧和通俗小说中，底层人物往往被类型化地塑造成某几种形象：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穷苦好人”，或愚昧滑稽、供人发笑的小人物，抑或奋发向上最终“鸡窝飞出金凤凰”的励志典型。这些类型化形象表面上提供了底层角色的能见度，实际却窄化甚至歪曲了底层生活的复杂性。比如，一些影视作品喜欢塑造底层的“奇迹”——寒门子弟通过个人奋斗平步青云——以迎合大众对于社会流动的幻想，却在无形中掩盖了大多数底层人难以改变命运的现实困境。又如在喜剧和段子中，“农民工”“穷屌丝”常被当作笑料，其生活窘态被夸张地表现以制造幽默效果。这类文化消费不仅没有真正同理底层，反而将底层的处境商品化为符号，在消费主义的狂欢中消解了应有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

大众文化对底层形象的再生产还有更加隐蔽的一面，即通过日常的叙事和象征，将社会等级的观念深植于公众心理。例如，在许多广告和影视中，城市中产和富裕阶层被赋予正面、时尚、值得向往的符号，而底层所代表的贫穷、体力劳动、粗鄙无知等则被标记为应被超越和避免的状态。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信息强化了一个“常识”：成功者理应享有更高的文化品位与道德水准，而处于底层的人由于自身“素质”欠缺才沦落如斯。这实际上呼应了中国社会中特有的“素质”话语，即把贫困和社会地位归因为个人或群体内在的素质不高。这套话语通过大众文化的再现予以循环，使底层群体自身也可能内化这种评价，从而陷入自我贬抑的身份认同危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并非铁板一块、永远由统治意识形态单方面塑造。随着新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发展，一些草根声音开始在大众文化场域中获得空间，挑战传统的底层刻板像。例如，“屌丝文化”的兴起即是底层（或自认为社会弱势的年轻人）对主流成功学话语的反讽性回应。网民自嘲为“屌丝”，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精英文化的霸权，表达出对社会不公平的调侃与抗议。然而，反讽毕竟有限，如果没有更深层的叙事和结构改变，“屌丝”认同可能陷入自我消费的循环。而近年来，中国网络涌现的一批“土味”视频及直播（例如一些出身农村或城市平民阶层的主播，通过朴实甚至粗粝的内容吸引大量关注）也引发关于“底层审美”的讨论。这些内容有时被都市观众当作猎奇的

对象，但也可能打破传统媒体对于审美和趣味的垄断，让底层文化以主体姿态“反哺”主流视野。例如，有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底层主体性时代”的来临，指出底层群体正以其声音和影响力，形塑着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转变，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演进方向的新视域 ((见 郑雯, 施畅, 和 桂勇 2022)) 这种网络文化的新动向表明，大众文化领域并非完全封闭，对于底层形象的再生产，也存在博弈和转圜的可能空间。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自发的草根之声真正促成大众对底层的新理解，而非很快被主流商业逻辑收编变质。这一问题也预示着我们在后文探讨“身份政治与话语突围”时要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 1.4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底层的生成

要理解当代底层问题，一个不可忽视的宏观背景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商品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但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极不平衡。对于底层群体而言，全球化往往既是机会的来临，更是新一轮压迫与剥夺的来袭。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塑造底层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首先，全球化重组了经济版图，制造出新的底层群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融入全球市场带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繁荣，但也促成了农民工阶层的崛起——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和建筑工地，成为世界工厂的“螺丝钉”。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承担着最繁重、最危险却报酬微薄的工作，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底层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实则与全球资本息息相关：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廉价劳动力，而中国的农村迁移劳动者正填补了这一角色。在这种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底层劳动者纵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难以分享到应有的成果；相反，他们面对的是工厂压榨、缺乏社会保障、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深圳富士康流水线工人的连环自杀、黑煤矿里矿工的生命无保障、女工在血汗工厂里超时工作，这些都是全球资本逐利下底层之殇的真实写照。

其次，全球化也在文化上塑造着底层的位置。全球媒体和消费文化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着中产和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对于身处底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一方面被卷入了一种全球化的欲望循环，渴望着广告和荧幕中展示的物质富裕与消费快乐；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排除在主流消费文化真正的主体之外，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受众。这种文化排斥与诱惑并存的局面，容易造成新的心理性压迫——底层群体在全球化所塑造的想象共同体中感到“相对剥夺”，他们被要求融入现代性与消费主义叙事，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被排斥的位置。因此，底层之身份不再只是一个本地或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

地位问题，同时也是被全球文化凝视所定义的位置。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我们也可看到类似“内部殖民”的情形：沿海发达城市俯视内地贫困地区，城市人带着偏见和优越感看待农村来客。这种态度上的分野与全球北-南的不平等关系如出一辙，只是在国内尺度上的翻版。

再次，全球化带来了观念层面的挑战，即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底层问题的影响。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至上和个人责任，倾向于将贫困视为个人失败或缺乏竞争力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国际机构、智库和媒体广泛传播，也在各国政策中有所体现。其结果是，底层群体在政策话语中被进一步边缘：福利被削减，社会保障被弱化，贫困被道德化。例如，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压力下放松劳工保护，以吸引投资，这无疑恶化了底层劳动者的处境。当底层处于全球资本漩涡中，国家的公共政策如果倾向资本而非劳工，就可能放任底层之殇的扩大化。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也出现了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区域和城乡差异悬殊的问题。资本逐利所到之处，底层群体往往成为“发展”的代价品：被拆迁的城中村居民、被污染破坏家园的底层社区、在竞争中失去土地的小农，这些现象都提示我们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不公。

在文学和影视中，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底层形象也频频出现，成为文化反思的主题之一。第六代/第七代导演的许多作品便直面了这一现实。贾樟柯的电影例如《世界》《二十四城记》《天注定》等，通过对小人物跨地域、跨时代遭遇的描绘，勾勒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的种种断裂与不平。比如《世界》里的主题公园女工，身处一个汇集全球地标的缩微景观，却无法真正触及外部世界的繁华，象征了全球化带来的幻想与隔膜并存的境遇；《天注定》由四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组成，涉及矿工讨薪血案、少女被迫卖淫、流水线工人绝望自杀等情节，几乎是对全球化浪潮中各类底层悲剧的纪录式展现。这些影像质问着高速发展的社会将何去何从，表现了资本逻辑渗透下人性的扭曲与挣扎。而在文学方面，余华的《兄弟》（后半部）辛辣地嘲讽了财富崇拜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的荒诞现象，莫言、梁鸿等作家的作品也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洪流中农村与城市底层的命运沉浮。这些文化产品使全球化背景下的底层处境得以被看见，也为大众提供了反思现代化代价的镜鉴。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文化作品的呈现与现实的改善之间依然有距离；底层之殇是否因为被艺术化地呈现而得到缓解，还有赖于社会结构和政策的真正变革。

## 1.5 文化产品：底层主体性的再现或遮蔽

文化产品（如文学、电影、艺术等）对于底层的呈现，是近二十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国，所谓“底层文学”的出现和讨论就是明证。2000年代初，“底层写作”成为

文坛热词，一批作家开始直面现实，将笔触深入社会底层的生活：刘庆邦以煤矿工人题材著称，他的中篇小说《神木》荣获老舍文学奖，之后改编成李杨执导的电影《盲井》，使刘庆邦凝结于文字的思想跃上银幕，映在更多观众的心中（见袁玉珍 2021）。另外如尹丽川、何三坡等作家也关注进城农民工、生存边缘人的故事。与此同时，更早成名的作家如余华、莫言等，也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小人物”的形象。面对这股文学潮流，批评界一方面肯定其现实关怀价值，另一方面也提出质疑：这些文化产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底层主体性的再现，抑或仍然是精英对底层的凝视与想象，从而对底层经验进行了某种遮蔽？

一方面，确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影视作品以写实态度呈现了底层的困境，给予了底层群体以某种“在场”的文化位置。例如，刘庆邦《神木》及其改编电影《盲井》通过对煤矿工人谋财害命事件的描写，将体制漏洞与人性扭曲交织的悲剧呈现在大众眼前。这部作品中，矿工既是受剥削的底层劳动者，也是铤而走险的加害者，复杂地打破了传统上“善良弱者 vs 恶毒压迫者”的二元叙事，凸显了底层生活中道德和生存两难的灰色地带。再如余华的《活着》聚焦一个农民在时代洪流中不断失去亲人的悲剧人生，深刻揭示了普通人在历史巨变和社会底层状态下的坚韧与无奈。贾樟柯电影《小武》《站台》等则细腻描绘了转型时期小城青年无所依傍的漂泊感。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底层视角的悲剧性力量，它震撼人心、引发同情，并促使社会对不公现实的关注。如果说文化可以为底层发声，这些作品确实提供了某种声道，让底层形象不再只是宏大叙事中的背景板，而有了具体可感的人物和故事。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反思，底层的主体性是否真正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得到了表达？抑或底层仍然没有真正“发声”，只是被代表了？斯皮瓦克关于“底层能否发声”的拷问在这里具有启发意义：她指出，即便底层说了话，也未必能被主流所听见或认真对待（见赵稀方 2009）。许多底层题材的作品，作者本身并非底层出身，而是怀着人道主义关怀或社会批判精神去描绘“他者”。这种“替言”在伦理上无可厚非，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底层缺乏话语权的现状。但风险在于，精英书写者容易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投射到底层角色身上，或者为了艺术效果而强化某些刻板印象。比如，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为了引发强烈情感，可能会过度渲染底层生活的悲惨，使之成为吸引眼球的“苦难秀”；或者，为了在主题上迎合社会批判的期待，作品中的底层形象有时会被类型化为纯粹的受害者、反抗英雄，缺少真实生活的复杂纹理。这样的再现方式虽然出发点是为底层发声，但结果上仍可能遮蔽了底层主体的丰富性，使他们被简化为某种符号。真正的底层主体性要求底层人能够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内涵不只是“出现在文本中”，更要在叙

述逻辑和价值立场上体现出来自底层的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在底层文化书写领域，近年也出现了一些由底层人士自身创作的作品，引发社会关注。例如，北京“皮村”农民工文学小组中涌现出的范雨素就是代表之一。2017年，农民工出身的保姆范雨素撰写的自传性散文《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爆红（（见施晨露 2023））这篇文章以平实而真挚的笔调讲述了她进城务工、多舛人生的经历和感悟，让无数读者第一次直面一个普通农村女性在时代巨变中的心声（（见饶翔 2017））范雨素的成名具有象征意义：它显示出底层群体也可以成为文化主体，他们的真实讲述能够引发广泛共鸣。正如有评论指出的，这篇文章的走红“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皮村之所在”（（见施晨露 2023））即第一次关切到在城市边缘生存的农民工社区。范雨素的出现，连同早些年工人诗人许立志（曾在富士康流水线写出沉痛诗篇）的事例，表明底层群体自身具备着潜在的叙事能力和创造力。一旦有适当的渠道和契机，他们可以以第一人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真正实现底层主体性再现的关键一步：由底层主体“自我呈现”，而非仅仅“被呈现”。

总体来看，文化产品对于底层的再现是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既有赋权与见证，也有挪用与遮蔽。学者曾指出，“底层能否发声”的问题涉及两个层次：其一是底层作为整体能否表达自身，其二是即便表达了能否被听见（（见严飞 2022））对于文化创作者和批评者而言，这提醒我们在欣赏和分析底层题材作品时，要始终警惕权力关系对叙事的影响，努力发掘作品中真正来源于底层主体的声音。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让更多底层个体参与到文化生产中，用他们的叙事补充乃至改写精英叙事，这是打破“底层之殇”叙事框架的重要路径之一。

## 1.6 女性主义介入下的底层经验

底层经验从来不是抽象的人类共同体经验，而是具体的人以其交叉的身份经历的生活。性别作为基本的社会分类之一，与阶级、种族等交织成复杂的压迫格局。在底层之中，女性往往承受着比男性更为繁重的负担和更隐蔽的歧视，这正是女性主义理论必须介入底层话题的原因所在。

首先，女性在底层群体中往往面临“双重的边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底层女性大多从事报酬更低、社会评价更低的工作。例如，女农民工集中于纺织、电子装配等流水线行业，或是服务业中的保洁、护理等职位；这些工作通常比男性所从事的建筑、运输等更低薪且缺乏晋升空间。同时，由于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底层女性往往还承担着繁重的家庭照料职责——无论是照看孩子还是赡养老人，她们投入的大量无偿劳动在经济统计



中被忽视，却严重消耗了其个人发展和休息的时间精力。这种“生产+再生产”双重劳动，使底层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疲惫和贫困的陷阱。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中，女性更容易滑入贫困并难以脱贫，出现所谓“贫困女性化”的趋势。这并非因为女性不够勤劳，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制度和社会预期将不相称的压力叠加在她们身上。在文化语境里，这些底层女性的付出经常被浪漫化（如所谓“贤妻良母”“劳苦撑家”的形象）或被视为理所当然，女性个体的主体需求和权利则被忽略。

其次，底层女性常常遭遇特有的暴力和压迫形式。譬如，拐卖妇女、强迫卖淫等触目惊心的事件，其受害者主要就是社会底层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经济和教育资源的匮乏，更容易被人贩子和剥削者盯上，陷入无法自主掌控的人生境地。李杨导演的电影《盲山》以纪实风格呈现了一位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偏远山村充当童养媳的故事。片中女主角遭受的身心摧残，以及全村男性对她的禁锢，令人震撼地揭示了底层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暴力生态。这种暴力并非简单的个案，而是贫困、无知与父权体制交织所酿成的苦果。在许多农村或城市边缘社区，女性的身体往往成为控制的对象：她们被要求牺牲自己的梦想为家庭付出，被要求默默忍受家暴或性侵，因为“无处可逃”“无力反抗”。如果说男性底层人士面对的是资本和体制的压迫，那么女性底层人士还额外面对着来自父权制的压迫。女性主义关怀正是在于揭开这些沉默角落里的不公，让底层女性遭遇的话语进入公众视野，并主张赋予她们必要的支持与解放。

再者，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底层经验提供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分析工具。美国法律学者金伯利·克兰肖提出的交叉性理论指出，不同身份轴线的交汇会产生独特的压迫情境。一个底层出身的女性，既非典型意义上的“所有女性”（因为阶级使其处境迥异于中产或精英女性），也非抽象意义上的“所有底层人”（因为性别又使其经历不同于同阶级男性）。她的经验需要被作为独特的整体来看待。例如，女工集体的抗争可能既包含对血汗工厂剥削的不满，也包含对性骚扰、性别歧视的抗议。又如，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农民工时发现，女农民工对于生育权、对子女教育的诉求往往高于男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她们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福祉。女性主义进入底层研究，意味着我们的分析和行动都要更精细，对多维度的不公正保持敏感。通过交叉性视角，我们既可以避免用单一框架套用复杂现实，也能够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改善底层女性的处境。

近年来，女性主义者和底层女性自身也开始更多地发出联合声。在劳工维权、社区组织中出现了女性工作者、志愿者的身影，她们致力于为女工提供法律帮助、开办教育讲座、建立互助网络，使底层女性能够彼此支持、增强能力。文化层面，也有一些作品专门呈现底层女性视角，如纪录片《女工》（对打工妹生活的纪实）、小说《云中唱歌的女

孩》等等。这些尝试在呼应戴锦华等学者的倡导：将女性从边缘拉回历史和现实的叙事之中。戴锦华本人就曾对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做出深刻批评，强调女性不应只是大历史中的沉默者或点缀。同理，在底层叙事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女性成为能动的讲述者和变革的发动者。唯有如此，关于底层的知识生产和文化表达才不会继续忽略半数人类的命运，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底层之殇”的全景，并找到性别平等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路。

## 1.7 底层叙事与身份政治：话语突围的可能

面对主流话语对底层的规训与遮蔽，底层群体如何重新叙述自身，如何将自身从被建构的客体变为主动的主体，这是底层叙事与身份政治所关注的核心。在当代社会，“身份政治”一词通常与种族、性别等认同相关联，但其实，阶级/底层认同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基础。当底层群体开始以“我们”的身份来发声和行动，而非被分割为无数孤立的个人，他们便有可能突破主流话语的压制，争夺对自身命运的定义权。

主流话语对底层的规训体现在多个方面：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压制（例如通过政策、法律限制底层的集体行动与权利主张），也包括符号和观念层面的支配。这种规训通过教育、媒体话语等机制，使底层群体接受“你们无力改变，只能依靠怜悯或自身奋斗”的叙事，抑或让社会大众相信“社会已经尽力，底层的不幸主要源于他们自己的原因”。这种叙事秩序确保了底层难以形成集体意识，更遑论质疑整体制度。但历史经验表明，当被压迫者能够打破规训，在话语上实现主体性的觉醒时，社会有可能出现重要的进步。例如，20 世纪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往往先是在观念上孕育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我们工人”或“我们穷人”有共同利益，需要团结斗争——随后这种认同转化为集体行动力量。

在当代中国，直接以阶级叙事动员或进行政治抗争的空间较为有限，但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底层叙事的变奏仍然可见。一个典型例子是网络空间中底层网民的舆论力量上升。借助微博、微信等平台，许多底层个体可以就社会事件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前文提到的“底层主体性时代”的研究发现，底层网民在舆论场中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他们关注的不公议题和表达的愤怒情绪，对公共讨论产生了实质影响（见 郑雯, 施畅, 和 桂勇 2022）例如，当发生矿难、强拆等涉及底层利益的事件时，社交媒体上会涌现大量普通用户的转发和评论，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官方回应。这可以看作一种新形式的身份政治：底层未必以正式的工会或社会运动现身，但通过网络聚合，形成了“情感的共同体”和“话语的共同体”。他们可能并不直接称自己为“底层”，却在具体议题上展现来自社会底部的愤慨与诉求。这种不成形的身份政治，是对主流话语场域的挤占，迫使社会聆

听那些原本容易被忽略的声音。

除了网络，一些现实中的文化或社会运动也可视为底层身份政治的展现。譬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开始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各种互助和文化活动，如打工子弟学校的家长团体争取教育资源，城郊棚户区居民自发成立维权小组记录环境污染。这些行动往往伴随着他们对于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义：不再把自己仅仅看作“外地人”或“失败者”，而是强调作为劳动者、市民应有的权利。文学艺术亦有参与身份再造的力量，例如工人诗歌、农民工春晚（由草根组织的新春联欢晚会）等，都是底层群体用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形式讲述自身故事、庆祝自身存在的尝试。这些叙事实践使底层不再完全处于沉默被看的位置，他们也在看，在说，并通过叙述来增强自我认同和凝聚力。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底层身份政治的道路充满艰难。既有的强大话语机器会不断试图吸纳、改造乃至消解这些草根叙事。例如，一旦某种底层文化形式走红，商业资本和主流媒体可能迅速介入，将其包装成消费娱乐的新卖点，从而削弱其中的批判锋芒。底层叙事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组织和行动，也容易被上层力量所利用，成为一时的舆论话题而未能转化为长久的社会推动力。身份认同本身也有风险：过度强调“底层”身份可能会陷入自我他者化，甚至形成与其他群体的对立，导致内部的分裂（例如底层内部不同群体、不同地域间的隔阂），或者被民粹主义者利用，走向狭隘和排外。

因此，底层叙事与身份政治的价值在于唤醒主体意识和凝聚共同力量，但也需要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盟和制度诉求相结合。关键在于持续地拓展底层表达的空间，累积小的胜利来建立信心，同时避免将底层身份本质化。正如女性主义的经验所示，只有将特定身份的诉求纳入普遍解放的议程，才能既保持独特性又争取广泛支持。对于底层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叙事不应是孤立的抱怨，而要与公平正义的普遍价值对接；底层身份的政治，不是为了建立新的封闭身份等级，而是为了打破旧有的等级，让社会朝向更平等的结构转型。

通过叙事来突围主流话语，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从“讲述底层”到“底层自述”，再到“我们即社会”这样一种开放格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突破口，无论是网络世界的喧哗，还是文学舞台上的新声，都在不断提醒我们：那些被称作“底层”的人正在开口说话，质疑既定的叙事。如同黑暗中的点点星火，这些声音有可能连成燎原之势，驱散笼罩在底层之上的刻板成见和悲情迷雾。

## 1.8 避免“底层之殇”的文化策略

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认识到底层之殇的形成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因此，要避免这一悲剧的不断重演，离不开文化层面的反思与策略。以下提出若干文化策略，旨在从观念、叙事和实践上对“底层之殇”的再生产加以干预：

- 多元主体参与的叙事重建：鼓励和支持底层群体自身参与文化生产，使叙事主体呈现多元化。可以通过社区写作工作坊、底层群体口述史项目、草根影像计划等方式，提供培训和平台，让更多底层个体记录和传播自己的故事。通过这些实践，打破精英垄断叙事的局面，使大众能够直接听见来自底层的多声部声音，丰富社会对底层生活的理解。
- 文化机构与政策扶持：政府及文化机构应有意识地扶持关注底层题材的严肃文艺创作，以及底层群体自发的文化活动。例如，增设文学奖项或基金鼓励描写底层现实的优秀作品；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学校、乡村文化站等基层文化阵地提供经费和专业支持；推动主流媒体开设专题栏目报道底层民众关心的议题，以主流渠道扩大底层声音的影响力。
- 挑战刻板印象的媒体实践：媒体工作者和文艺创作者应接受关于阶级、性别、族群敏感性的培训，在作品中避免再生产偏见。新闻报道应尽量揭示底层困境背后的制度因素，避免单纯以个人道德评判底层事件；影视剧创作应塑造更立体多样的底层人物形象，赋予他们和其他阶层同样的复杂人性和发展弧光，而非扁平化地标签化。在喜剧和娱乐内容中，也应适度规避以羞辱弱势群体为笑点的做法，通过行业自律和审查引导，逐步改变大众文化中嘲弄底层的陈规陋习。
- 跨界联盟与公共对话：发起跨越阶层的文化对话和合作项目，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共同参与。比如，组织大学生与农民工、艺术家与底层工友联合开展社区艺术创作，或通过纪录片、摄影展等形式让底层和精英彼此讲述和倾听。这类跨界交流有助于消弭刻板印象，培养社会整体的同理心，并将底层议题带入更广泛的公共讨论视野。文化精英（学者、记者、艺术家）也应以前盟者而非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底层群体合作，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维护底层权益的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 强化教育中的平等意识：在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融入对底层问题的理解和人文关怀。课程教材可以增加关于社会阶层流动、贫困成因、劳动者贡献的内容，引导年轻一代正视社会不平等现实，树立平等观念。鼓励学校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会调研，使其有机会接触不同阶层的生活，加深对底层群体的认知与尊重。通过

教育让全社会形成共识：每个人的尊严都应得到维护，底层之痛不应成为冷漠围观的对象，而是需要共同解决的社会病症。

- 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舆论倡导：文化策略最终需要与制度变革对接。文艺作品和媒体应持续将公众目光引向那些深层次的不公问题（如土地制度、户籍限制、劳工权益保护等），为改革创造舆论基础。当文化不断提出问题、质疑现状，就能在社会中累积起对底层处境改善的支持力量，促使决策者重视并采取行动。比如，通过描写欠薪悲剧的影视剧，引发对劳工法落实的关注，进而推动官方加强执法；通过呈现留守儿童困境的报道，促成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等。

以上策略并非一蹴而就之计，但它们从不同层面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重塑社会的文化想象，使“底层”不再等同于被动受难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有尊严、有主体性、可以参与共同体事务的公民角色。当底层群体被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他们自身也会更有力量挣脱宿命般的悲剧循环。通过持续的文化努力和社会改革的呼应，我们或许有望逐步化解“底层之殇”，让底层群体迎来不再以悲情注脚结尾的未来。

## 1.9 结语

“底层如何设计”这一命题，归根结底是在追问：我们如何通过改变对底层的叙事和想象，进而改变现实中底层所处的命运轨迹。在这篇专论中，我们运用多重理论视角揭示了底层之殇的文化成因，也探索了可能的解困之道。从大众文化的批判到全球化的审视，从文化产品的自省到女性主义的介入，再到底层主体觉醒与身份政治的兴起，我们试图描绘出一幅复杂却充满希望的图景：底层不是凝固不变的、他者化的形象；底层更不应是永远被悲剧定义的命运共同体。当底层群体的多样声音得到倾听，他们的形象得到丰富和纠偏，他们的权利诉求得到正视，那么“底层之殇”便有可能逐步被疗愈。

当然，文化变迁的力量必须与经济和政治变革相辅相成。只有在社会结构日趋公平、底层群体拥有更多物质保障和政治参与机会的条件下，文化层面的努力才能真正落地生根。然而，文化变革往往是推动其他变革的前奏和灵魂。它塑造人们的观念疆界，决定着社会对于何为公正、何为可接受的态度。如果说过去底层之殇反复上演，部分原因在于主流文化默许甚至歌颂了不平等的合理性；那么未来要避免重蹈覆辙，就需要一种新的文化共识：不让任何一个群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落下，也不让任何一种苦难被浪漫化地接受。

文化研究的视角提醒我们，改变社会想象是可能的，而学术的介入正是为此铺路架桥。

当批判的锋芒指向掩盖不公的叙事，当底层的故事以第一人称述说，当女性、少数族裔等所有边缘声音彼此呼应，当这样一个更民主的文化场域形成之时，底层将不再是被设计、被规训的对象，而将成为共同设计未来的平等参与者。那将是对“底层之殇”最有力的终结。

严飞. 2022. 《〈打工文学〉里藏着底层写作者们的心声》. <https://m.huxiu.com/article/711344.html>.

施晨露. 2023. 《《我是范雨素》后，和范雨素〈久别重逢〉 - 新闻 - 中国作家网》.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09/c403994-32602552.html>.

袁玉珍. 2021. 《从获奖作品《神木》到国际大奖电影《盲井》| 老舍 | 刘庆邦》.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BVQU1460514RM6G.html>.

赵稀方. 2009. 《赵稀方：斯皮瓦克与后殖民批评 - 乌有之乡》. <http://www.wyxxwk.com/Article/sichao/2009/09/17768.html>.

郑雯, 施畅, 和 桂勇. 2022. 《〈底层主体性时代〉：理解中国网络空间的新视域》. [https://fddi.fudan.edu.cn/\\_t2515/6a/0c/c19046a420364/page.htm](https://fddi.fudan.edu.cn/_t2515/6a/0c/c19046a420364/page.htm).

饶翔. 2017. 《《我是范雨素》何以打动人心 - 光明网》. [https://news.gmw.cn/2017-05/01/content\\_24348599.htm](https://news.gmw.cn/2017-05/01/content_24348599.htm).